

海扎姆·莱拉·梅琳达博士 (*Hezam Leila Melinda*)

行刑机构中的调解:我国 刑事司法系统的战略范式转变



概述

在匈牙利,对人身、财产和交通案件可以采用刑事调解。其法定前提是行为人为人认罪并且在调解程序范围内,赔偿所造成的,被判三年以下监禁的损失。如果上述几项条件同时成立,行为人不能受到惩罚。近几年,匈牙利调解程序法律发生的变化基础上,我们有理由认为,匈牙利立法者的目的是扩大调解程序的范围。证明这一点的是,如果根据法律对有关犯罪行为可适用的处罚不超过五年,也可以使用刑事调解。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无限制地减轻处罚。

然而,根据现行匈牙利法律,如果行为人是多重累犯,或者因法院的最终裁定在服刑期,不允许适用刑事调解。也就是说,尽管不断要求扩大其范围,但调解的适用范围仍然很狭窄。其正面的结果,如受害者和行为人共同处理所经历的创伤,确保赔偿的可能,或促进与社会的眷恋,并没有充分纳入行刑机构重返社会的政策中。反而,行刑机构所使用的是一套所谓的主流重返社会手段,特别是教育和就业的各种形式。

经济文献杂志 (JEL) 代码: K14, K15, K19, K49

关键词: 调解、主流重返社会手段、社会价值、能力发展、重返社会战略、行为矫正

匈牙利刑事司法系统中的重返社会政策

海扎姆·莱拉·梅琳达博士 (Dr. Hezam Leila Melinda) 是匈牙利公报、报刊和图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Magyar Közlöny Lap-és Könyvkiadó Kft.) 的法律事务科员 (hezam.leila@gmail.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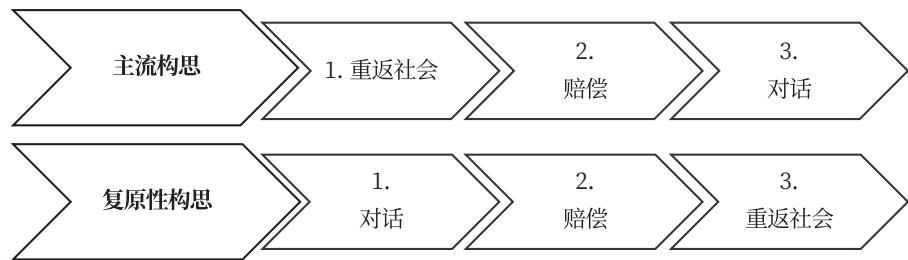
在运作良好社会的司法体系中,法治下的刑法建立在惩罚和重返社会这两个概念上。在这样形成的多极司法体系中,主流型重返社会政策正成为越来越不合时宜的。这导致了一种新型刑事司法观念的建构。它不再局限于旨在培养能力的传统监狱活动(如教育和就业)。随着基于新基础的观念发展,重返社会活动的重点越来越转向跨学科和多学科领域,如犯罪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或犯罪教育学支持的人格发展过程,其视野也越来越多地扩展到社会关系体系。为了确保重返社会的长期有效性,必须扩大行刑机构的重返社会观念视野,重新思考目前的战略,将支持社会依恋的方案更有效地纳入预防犯罪方案,并激发服刑人员参与积极性。尽管几乎所有关于这一主题的重要国内刑事研究论文都分析重返社会可能的手段(而且不断扩大方法),注重于个人发展的战略还没有在匈牙利行刑机构中广普及。就因为这个原因,有必要对另类重返社会手段层面及其实际效用进行深入研究,并特别关注调解,因为调解可以通过关系复原对重返社会产生重大作用。

我国行刑机构主要是通过基于行为矫正的重返社会方案试图修改促使人们犯罪的致罪因素(如态度、个性、承担责任的意愿等)。尽管在国内文献中可以找到以人格发展为重点的并且由多个学科支持的重返社会概念,但是国家和社会两方面对重返社会的需求迫使各行刑机构将理论融入实践并不断创新方法。这样做的目的是有效地促进服刑人员重新融入社会。然而,对这些方法的综合、战略性应用和系统性分析仍有待进行。重返社会的跨学科方法究竟为什么如此重要?答案在于这些方法的人格转变效果,因为精心设计的重返社会过程可以将罪犯转变为悔改者,将受害者转变为幸存者,将冲突转变为团结。

人力资源发展行动方案(EFOP)“服刑人员重返社会”旗舰项目是匈牙利重返社会工作的美好创新,到2021年春季,约有42亿福林被投入收敛区域,从而帮助促进成功适应社会。匈牙利行刑机构的重返社会范式转变也受益于匈牙利预防犯罪理事会(Nemzeti Bűnmegelőzési Tanács)至2023年为止的战略中。该战略要求在匈牙利服刑期间使用一些创新方案。其独特之处在于它旨在通过发展服刑人员的个性、个人能力和社交能力来防止再次犯罪。然而,除了改善目前使用的重返社会标准的质量外,还需要向新的、替代性的工具开放,并引入复原性的方法。

复原性方法与主流重返社会方法不同之处在于其出发点。复原性方法将犯罪重新解释,其中犯罪行为意味着一种对人际关系造成损害的冲突(Christie, 1977)。“恢复性”一词指的是该方法的主要目的,即无非是恢复被侵犯的秩序。而且恢复性理论的目的也不仅仅是支持受害者,还包括让犯罪行为人为重新融入社会。(Barabás, 2020)

图1、主流和恢复性司法的范式转变



来源：根据凯莱日（Kerezi, 2011）著者自己编制

范式转变的好处在于，放在首位的对话甚至可以自然地导致成功的重返社会。两者之间的联系是由对话（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调解）诱发的人格转变因素所创。所有这一切表明，如果没有一个注重人格发展的，基于社会对话的方案，就不可能长期维持（在法律框架规定的模式层面上也）成功的重返社会框架（Duff, 2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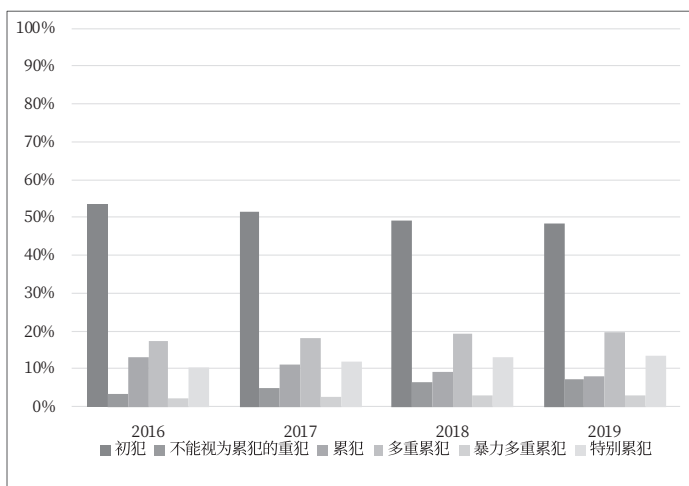
匈牙利重返社会情况, 特别关注于主流重返社会方案

在匈牙利各种行刑机构中，目前有7,400人在监狱等级服刑（占平均服刑人数的55%）。相比之下，在高度警戒监狱等级服刑的服刑人员比例约为34%，也就是说，平均有34%的服刑人员受到更严峻的刑罚执行等级的破坏性影响，也就是受到更显著的社会隔离。然而，有利的进展是，虽然2020年服刑人员的总数比上一年增加了3%，但在高度警戒监狱中服刑的人数却以同样的数量降低（据匈牙利国家监狱管理指挥部的数据）。

高度警戒监狱服刑人员（特别是那些长期服刑的人），从重返社会的角度来看，对我国行刑机构来说，是持续而严峻的挑战，因为他们更多地受到剥夺自由、与环境隔绝、缺乏人际关系等其他剥夺效应的影响。这可能对服刑人员的人格产生负面影响。然而，即使使用调解并不意味着立即中止监禁处罚或服刑人员希望得到的优惠措施，基于对话、忏悔和道德对抗的调解过程可以成为减轻这些不良影响的合适手段。

就重新融入社会的方法和重新融入社会的模式而言，应特别注意行刑机构解决拘留导致的人格和行为问题。累犯的数量表明长期监禁后重返社会的艰难。

图2、初犯和累犯在服刑人员总数中的分布情况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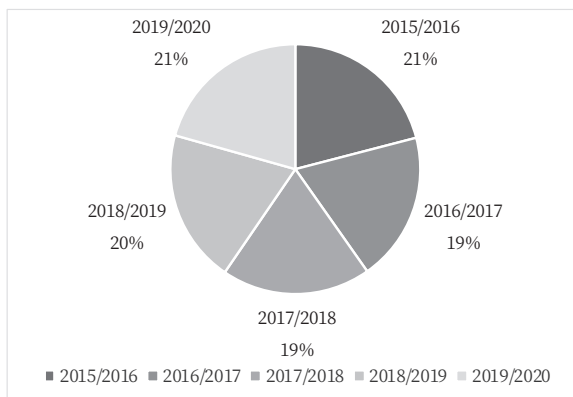


来源: 《监狱统计评论》(Börtönstatistikai Szemle 2016-2020年) 著者编制

在所调查的年份中, 51%以上的服刑人员为初犯, 而累犯的比例在下降。然而, 值得进一步研究这些乍看之下很令人高兴的统计数据, 因为特别累犯的比例呈上升趋势。多重累犯的数量也是如此。因此可以说, 减少犯罪的刑事政策努力大概不是无效的, 但目前的刑行措施并没有导致再犯罪的显著降低及其数量的稳定。

行刑机构目前的重返社会模式以教育和就业为主。这表明行刑机构认为, 促进成功进入劳动力市场是发展社会联系的关键因素 (Schmehl, 2015)。接受教育和就业的服刑人员的数据也证实了这些形式的重返社会方案的预期结果。

图3、接收教育的服刑人员比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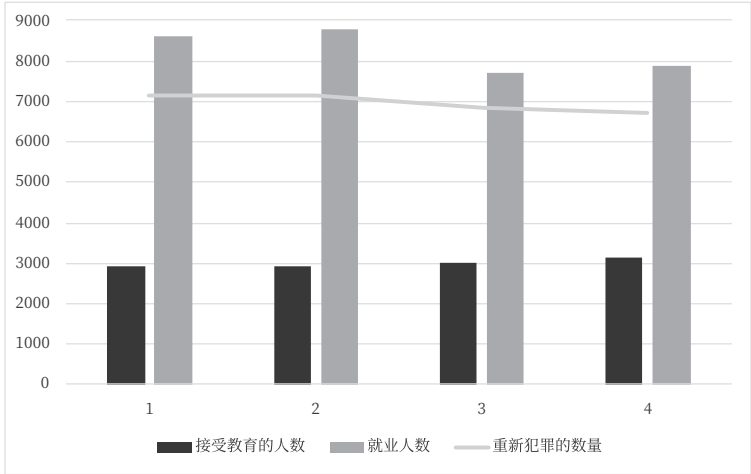
来源: 《监狱统计评论》(Börtönstatistikai Szemle 2020年) 著者编制

从2016-2017学年到2019-2020学年，接受教育的服刑人员在服刑人员总数中的比例持续增长。就教育类型而言，服刑人员往往主要参加中等教育（40%）和职业培训（30%）。对接受小学教育（29%）和高等教育（1%）的兴趣不大。

值得注意的是，在主流重返社会的框架内，行刑机构对就业的积极回报和教育一样依赖。就因为这个原因，各个机构必须不断努力，以确保有适当数量的雇主提供尽可能大量的工作机会（Szakolczai, 2015）。通过为此目的创建的，主要是工业和农业公司，行刑机构内的就业，以及通过公私合营（PPP）模式就业，即国家和私营部门之间的伙伴关系来实现这一目标。为了确定主流重返社会模式是否有效，最好研究接受教育和就业的人数与累犯人数的相互关系。

然而，应该注意的是，重新犯罪和服刑人数的趋势可能受到加严的刑罚政策影响，因为立法者希望通过劝阻性的处罚来阻止犯罪的行为人。

图4、主流重犯社会方案和重新犯罪的关系



来源：《监狱统计评论》（*Börtönstatisztikai Szemle* 2020年）著者编制

虽然接受教育的服刑人数显示出轻微但稳定的增长，平均有一半以上的服刑人员参加就业，但（包括累犯、特别累犯和多重累犯在内的）重新犯罪率的增长力度要低得多（平均为3%），也就是说，相关性很弱。因此，统计结果充分证明，有必要提高当前重返社会模式中所使用方案的效率。但是，将重返社会政策以调解因素扩大，在短期、中期和长期内都可以适当支持国内刑事政策目标。

主流重返社会方案的挑战 应对跨学科性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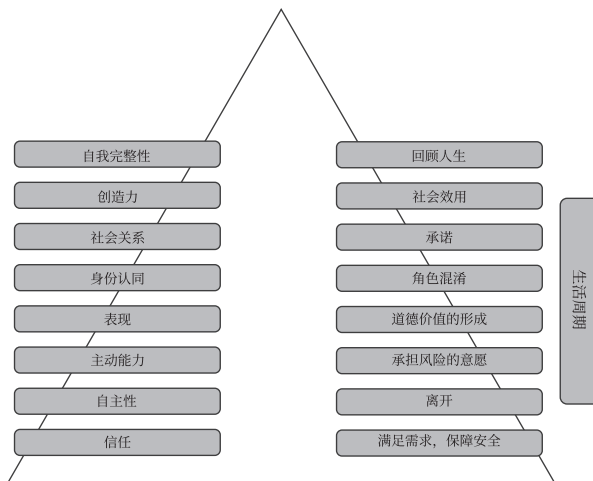
犯罪行为的研究表明，在遭受犯罪行为和成为受害者之后，未经治疗的创伤通常会导致焦虑不安、断绝社交联系和生活质量的逐渐恶化。当然，这个现象

在较严重或暴力犯罪的行为人和受害人的情况下都会出现, 而且也可能发生在不太严重的犯罪情况下 (Barabás, 2020)。就因为此原因, 无论是在刑事诉讼阶段, 还是在定罪之后, 在服刑期间, 解决已产生的创伤是至关重要的。

有许多因素会阻碍成功的重返社会。从服刑人员的角度来看, 全控机构显然是个困难。另一个抑制因素是, 尽管刑事政策加严, 如果守法行为不成为人格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 守法行为不内部化, 就必须长期实施惩罚, 以产生劝阻作用。所以需要不断的外部塑造力, 因为社会上接受的行为没有成为自己的坚信 (Zimbardo et al., 2017)。而一旦惩罚的威胁不再存在, 惩罚改变行为的力量就会消失 (Skinner, 1953)。假设奖励的诱惑 (也就是说, 如果奖励的承诺是如此之大, 以至于可以压倒通过潜在的惩罚所要付出的代价) 是妨碍处罚有效性的因素 (Lewitt - Dubner, 2005)。因此, 如果我们不能控制奖励, 通过惩罚来控制行为的系统将会失败。国内刑行系统中一个普遍的现象是惩罚之所以适得其反, 是因为监狱环境激起人们的攻击性。而且, 恐惧现象也不能忽视; 它也会阻碍人们掌握预期的行为 (Zimbardo et al., 2017)。

对于重视犯罪的社会控制的人来说, 重要的不仅是要防止犯罪行为的蔓延, 而且控制和预防警方视野中的所有形式的异常行为不分伯仲 (MacKenzie, 2006)。所谓的埃里克森的理论对此提供帮助。在他的社会心理发展理论中, 埃里克森将社会化过程分为人类生活的八个阶段, 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危机。他认为, 如未能成功克服危机, 人格就会被扭曲、变形, 直到危机得到解决为止 (N. Kollár-Szabó, 2004)。在危机发生之前, 现有价值观危机。这必然导致异常行为的形成 (Antalóczy, 2014)。

图5、埃里克森的社会心理发展模式



来源: 根据N科拉尔-萨博 (N. Kollár-Szabó, 2004) 著者编制

埃里克森通过界定对每个生命阶段的最佳结果（安全感、脱离能力、承担风险的愿意等）区分了对健康人格的发展至关重要的标准（自信、独立的能力，即自主性、主动性等）。如果不能实现模型结果，会导致个性危机。这些危机可以被看作是服刑人员重返社会的潜在干预点。根德罗（Gendreau）的研究表明摸底干预点的需要，并且确定反社会行为、异常的社会关系、以前的反社会行为以及不良的家庭和父母关系与犯罪倾向密切相关。因此，重返社会方案也应考虑到人格的这些方面（Gendreau et al., 1992）。因此，促进重新融入社会和减少再犯罪的有效性还需要在国内监狱系统中符合服刑人员情况、个性和个人需求的方案。所有这些都证明社会学、心理学和其他跨学科社会科学的使用以及在监狱中践行信仰是有意义的（Dowden – Andrews, 1999）。

冠状病毒疫情对我国重返社会方案造成的挑战

冠状病毒病的出现以及防止其在行刑机构内的传播，给行刑机构工作人员带来了许多技术和卫生方面的挑战。制定减轻流行病安全风险的方案、采用预防战略和实施有效的机制，诚然需要非同寻常的资源。此外，环境的变化也促使行刑机构体系重新思考其重返社会的工具（例如：如何联系家属）。在执行过程中，确保社会接触的机会尤为重要，因为通过剥夺服刑人员的社会关系，监狱可能会加强阻碍服刑人员将来重新融入社会的行为、心理和情感模式。所以COVID-19导致使用新技术工具，以确保既能遏制在有限空间内迅速蔓延的流行病，又能确保重新融入社会的长期有效性（Somogyvári, 2021）。

从2020年3月起，我国暂停了对监狱的访问和临时释放的批准。最初的严格措施从2021年夏季开始逐渐放松。然而，从2021年11月起，根据全国行刑机构总司令部（简称BvOP）参谋部的建议，行刑机构内又暂停接待访客（Czenczer, 2021）。然而，监狱顺利提供另类联系手段，据此每个服刑人员都可以免费使用Skype软件与家人联系。联系方式方面的创新至关重要，因为优质的家庭关系可以减少重新犯罪的可能性，其综合效果可导致再犯罪有关的指标会改善，最终使整个社会受益。

虽然疫情以及疫情传播风险对行刑机构带来了非凡的挑战，但我国相关的（包括BvOP自己的）经验研究表明，对疫情的控制和支持重返社会的措施方面是有效的。

扩大调解的实际应用范围,我国刑行中对范式转变的需求

在匈牙利，自2007年1月1日起，执法部门有可能对刑事案件进行调解，而自2014年1月1日起，也可以对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犯罪行为，即违规案件进行调解。当然，不仅在刑事案件中可以使用调解，在此之前，在民事案件中也可以使用（Barabás, 2020）。然而，必须注意的是，这些程序的重点主要是在被害人身上，帮助他们处理冤情。尽管对被害者的支持是后现代刑事诉讼程序的基本要

素,但不能忽视的是,调解对行为人重新融入社会同样有帮助,因为它有助于正视犯罪、发展责任干和道德判断力。

之所以可以引入这个新法律制度,是因为修改《刑事诉讼程序法》的2006年第五十一号法律在《刑事诉讼程序法》中添加了构成刑事责任消灭事由的“积极悔改”(这是调解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Barabás, 2020)。在《监狱法典》中的出现反映调解程序的扩大。《监狱法》第171条将调解的使用范围扩大到处理服刑人员之间的纠纷。据其,如果被判人参与调解程序,纪律处分权行使当局可以因被判刑人对另一被判刑人所犯违规行为而开展的程序终止或暂停执行处罚。

应该指出的是,治疗思想和教学乐观主义的使用仍然无法保证避免,但可以帮助避免再犯(Lőrincz, 2018)。可以转变固定不正确的心态,帮助人们重新融入社会,而不需要复杂的、结构良好的矫正行为疗法。此外,还可以“渗透到人格的深处”,甚至帮助减少支持犯罪的态度。调解的众多优势进一步证明匈牙利行刑机构所需的重返社会范式转变,即引入调解作为重返社会的工具。其中一个好处是,各方需要多少时间来解决矛盾,就花多少时间。因此,各方有机会通过创新的解决方案来解决利益伤害问题。该程序是灵活的,这有助于解决冲突的所有维度,并加强各方之间达成协议的可持续性。调解还为个人康复,即恢复行为人的人格和不当行为模式,从而最终为成功重新融入社会铺平道路(Colson, 2021)。因此,国内刑罚体系的范式转变将使正式司法体系无法做到的成果成为可能,为解决行为人和被害人之间的矛盾创造机会。而对所经历的犯罪行为进行共同处理,无疑有助于重返社会(Resch, 2014)。正是这些积极的效果表明,在监禁期间使用调解可以为再犯统计带来新的转机。因为重新融入社会需要多方位的努力:刑满释放者的正确态度很重要(对避免再犯罪的意愿、忏悔等),但欢迎的环境、宽容的反应也是至关重要的(Kerezsi, 2011)。然而,通过将双方之间的矛盾从社会范围内移除,而这一冲突已被纳入监狱部门的职权范围,国家也取消了社会自身恢复失衡的法律秩序的机会,而被害人也失去了参与解决矛盾的机会(Christie, 1991)。刑罚执行的预防功能就在于此,也就是说,不仅要保护社会不受已经发生的犯罪影响,而且要保护社会未来不受犯罪的影响(Koósné, 2015)。

图6、在行刑机构中,重返社会的保障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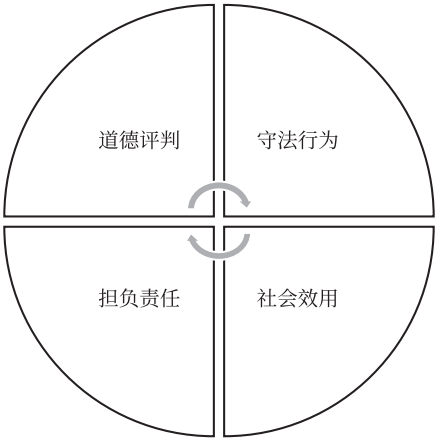


来源: 著者编制

重返社会的方案必然是多方面的，因为也要着重于个人素质、行为人的个性和社会关系的恢复。因此，必须指出的是，图6中鼓励的措施应同时并举，以协助重返社会。然而，只有当所掌握的原则走出意识形态领域并通过内部化成为内部信念时，这个过程才能长期成功。调解过程是相当多样化的，可以以许多值得注意的方法支持引导服刑人员重返社会（Vári, 2008）。

根据司法部的统计公报，2007年至2018年期间，匈牙利对近6万起刑事案件适用了调解，其中平均有85%的结案案件的当事人达成了协议，而近90%的协议得到了履行。2014年至2018年期间，在违规案件中，大约进行了11000次调解程序。在违规案件已完成的调解中，大约50-60%的案件中会达成协议，85%以上的协议得到了履行。这里介绍的统计结果表明，在刑事事项中使用调解的理由很广泛，根据这些结果也可以预测它们在监狱部门的有效性。

图7、刑法执行机构范围内调解的预期社会影响



来源：著者编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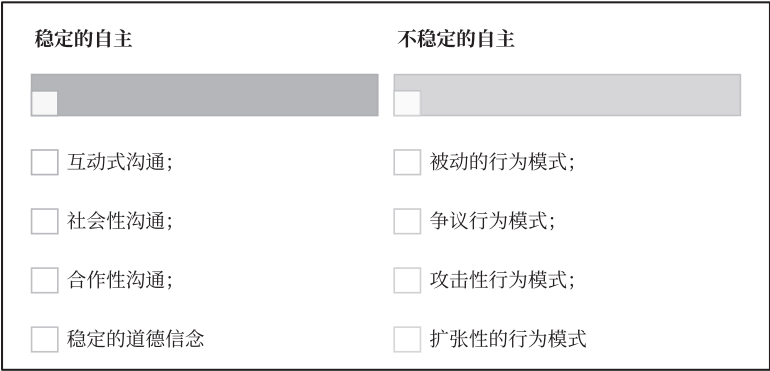
应用匈牙利多学科研究为基础的, 范围扩大的调解及其方法

以基督教为基础的领导力理论、教牧心理学和调解学的杰出匈牙利代表海凯尔·雷兹·罗伯特（Hecker-Réz）在2021年的作品中强调了所谓的自体治疗法的实用性。基于基督教方法的自体治疗法是一种心理教育学的方法，其中放弃不正确的固定沟通模式是必要的，以便开始互动，从而帮助各方实现他们的共同目标。从调解角度解释自体治疗法，自体治疗法是一种健康的自我阐释，以及通过发展沟通工具箱来理解对方的能力。也就是说，自体治疗法是对社会科学思想移植到一个新的多学科背景中，旨在确定各方之间沟通系统中的干预点，而且在这个系统中，各方之间的隔绝转变为合作。因此，在调解中关键的是对掌握不好的沟通传统进行结构性修正，也就是说，确定参与过程的各方在那些领域有不是个人的，

即不是内心信念的，而是学习到的角色或形成它的环境产生的行为模式（Hecker – Réz, 2021）。

内心信念是一种存在于个人决定中的现象。作为人格的组成部分，它表达的是相关人在特定情况下考虑问题，衡量和交流的方式。通过发展这种基于良心的决策机制，可以改善各方之间的沟通，使调解更加有效。因此，由于协助处理双方之间的矛盾，所以行刑领域的调解不仅在短期内可以有效，而且因为有助于减轻各方因侵犯权力行为而产生的焦虑和恐惧，在长期内也能有效。此外，还有助于服刑人员发展基于社会价值观的良知，最终有助于守法行为的形成（Hecker – Réz, 2021）。此外，调解有助于服刑人员重返社会的努力，因为在需要合作和纪律的过程中，会培养他的合作意愿、同理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能力都是成功重返社会的非常重要组成部分（Feuer, 2008）。由此可见，行刑期间的调解不仅可以看作为一种纠正方法，也可以看作为一种预防性方法。然而，还必须提到，除了赔偿物质损失和处理非物质损失造成的伤害之外，调解对被害人也起到有利的作用。社会发展理论的鼻祖埃里克森，将人的发展分为八个阶段，并定义了每个人生阶段的所谓基本冲突的特点。据他的论点，个人通过加强个人价值观和判断力才能以健康的方式完成发展过程。解决好的冲突可以使个人的信心、自主性、主动性和能力得到发展，这些都可以在未来解决冲突时适当地利用。虽然埃里克森写的是个性，但他的发现同样可以适用于人际关系（Lovaš-Herczog, 2019）。调解可以点明这个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绊脚石所在。因此，在具有重返社会效应的调解过程中，沟通渠道的有效性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后者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有关各方的个性，即参与程序的人的自主决定。自主的人在对话中以其价值观体系为指导，在其基础上表态并对其决定承担责任（Maier – Wrana, 2008）。

图8、决定调解效果的人格类型的沟通特点



来源：根据海凯尔-雷兹（Hecker-Réz, 2021）著者编制

自主稳定的人具有有效调解（即调解后能达成协议并解决冲突）所需的沟通能力，而自主不稳定的人在沟通过程中会面临许多困难。因为自主不稳定的人是一将其互动的、合作的和社会特征越来越丧失的人。

参与调解的自主不稳定的人通常有以下四种沟通模式。有被动的行为模式的人具有自我贬低的，放弃个人主动的行为特征，因此容忍对方的行为，放弃合作的可能。与此相反，争议行为模式人的沟通方式是寻求分歧、挑衅性，企图扩大双方方法之间的差距。与争议行为模式相似的，具有攻击性行为模式的人的沟通是敌对的、暴力的，因为他把与他接触的人看作为对手，因此不仅无法合作，又无法理解对方的观点。最后，在一个使用扩张型沟通策略的人在其关系中，有一种试图将对方纳入其中的倾向，也有一种在沟通中占主导的行为特征（Hecker – Réz, 2021）。鉴于行刑系统中侵权行为的性质，侵权的解决不仅需要外部第三方（即调解员）的干预，还需要特别注意沟通和各方的行为模式，因为这些都是决定调解成功的因素。因此在必要时确定和发展沟通能力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因此，通过范围更广的调解，即由多学科支持的社会科学方法（如沟通的发展），可以提高这个程序的效果。

除了纠正个人的沟通策略之外，参与谈判过程的人的正确定位也是一个关键因素。在调解过程中，各方使用他们已熟悉的，通常是攻击性的沟通策略和方法。这就证明定位过程是合理的。但是，基于创新原则的调解将定位谈判转变为基于利益和价值的谈判。调解员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在以利益和价值为基础的沟通过程中，各方的利益和需求得到澄清，那么各方的沟通质量可能会发生变化，各方为解决问题所做的努力会凸显出来。而在参与调解的各方表达的利益和情感需求基础上，各方可以走向共同解决冲突，处理创伤（Deák, 2020）。

在行刑环境中实际应用调解的支柱

如何解决争端和危机的方式，所采用的冲突管理程序等，很好地形容社会、社区以及其中的人（Lovas – Herczog, 2019）。调解正是描述社会危机管理状况的方法，一旦确定了适当的干预点，就可以开发冲突管理机制。托马斯（Thomas）和基尔曼（Kilmann）根据危机的原因对处理人际冲突的方法进行了区分，同时强调在冲突管理过程中，自我主张和关注对方的需求，这两个方面是并存的（Thomas – Kilmann, 1974）。因此，行刑系统环境中进行调解的第一个支柱（除了上文详述的对沟通策略的审查和对沟通机制的个人纠正之外）是找出产生冲突的原因，即澄清导致违法行为的动机。

图9、矛盾的种类

价值矛盾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合理化;· 沟通中的情感独立;
利益矛盾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个人利益的揭发;· 合作性的利益调解;
关系冲突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解决以往陈述导致的冲突;· 采用同理心能力;
资源矛盾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探索自愿;· 按照所确定的个人需求和要求分享自愿;
信息矛盾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澄清导致解决方案的信息;· 根据需求确定重要信息。

来源：根据洛沃什-海佐格（*Lovas-Herczog, 2019*）著者编制

调解过程的第二个支柱是找到各方的共同利益，其积极结果，各方可以发展解决冲突所需的合作技能。尽管有关各方的不同利益往往意味着似乎有利益冲突，指向他们之间冲突的不可解决，但在许多情况下是公正的第三方，即调解员，可以使各方脱离自己的立场，协助他们找到共同点（*Lovas – Herczog, 2019*）。

概论

基于教育和就业的传统重返社会方案的存在是重返社会必要的不足够组成部分，因为它们本身并不能消除对重返社会至关重要的致犯罪因素。在后者情况下，调解可以成为服刑期间的一个有效办法，因为可以帮助罪犯正视自己的行为，而且对话使罪犯保持在社会系统中，从而缓解隔离效应。忏悔和赔偿只能指望那些仍然眷恋的人。就因为这个原因，将罪犯保留在社会中是至关重要的（*Gönczöl, 2005*）。

成功重返社会需要采取多层面的措施。目前，国内行刑机构的特点是维持传统的重返社会实践，并不断对这些标准进行创新的需求。而创新越来越多地被嵌入到重返社会的方法中。这一可喜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那些呼吁范式转变的专家们的努力，但也要归功于那些对个人的可塑性有着坚定的信念的教会组织。因此，只有当行刑机构愿意超越目前的做法，研究扩大调解的实际好处，同时保持迄今使用的主流方法，重返社会才能在未来取得成功。当然，也需要对处理这些问题的工作人员进行培训。

备注

- ¹ https://bv.gov.hu/sites/default/files/Bortonstatisztikai_Szemle_2020.pdf
- ² <https://bv.gov.hu/sites/default/files/Bortonstatisztikai%20Szemle%202018%201.pdf>
- ³ <https://igazsagugyiinformaciok.kormany.hu/kozvetitoi-eljaras-bunteto-es-szabalysertesi-ugyekben>
- ⁴ <https://www.euro.who.int/en/health-topics/health-determinants/prisons-and-health/news/news/2020/3/preventing-covid-19-outbreak-in-prisons-a-challenging-but-essential-task-for-authorities>

参考文献

- Antalóczy, P. (2014): A vallás szerepe a fogvatartottak reszocializációjában 《宗教在服刑人员重新融入社会中的作用》*Börtönügyi Szemle*, 33. évfolyam, 4. szám. pp 19-27
- Colson, A. (2021): *ESSEC Business School, Negotiation, Mediation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Specialization* 《ESSEC商学院, 谈判、调解和冲突解决专业, 讲师说明》Instructor's Note, France, Cergy
- Barabás A., T. (2020): A mediáció alkalmazásának szélesedése a jog és a gyakorlat alapján a resztoratív elvek érvényesülése az igazságszolgáltatásban 《在法律和实践基础上扩大调解的应用, 在司法中应用恢复性原则》In. Hollán Mikolós, Mezei Kitty, *A büntetőjog hazai rendszere megújításának koncepcionális céljai* 《我国刑事司法系统改革的概念性目标》Társadalomtudományi Kutatóközpont kiadvány, Budapest. pp 39-47
- Christie, N. (1991): *A fájdalom korlátai* 《疼痛的极限》Magvető Könyvkiadó, Budapest. 149p
- Christie, N. (1977): Conflicts as property 《冲突作为财产》*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1977/1. pp 1-15
- Czenczer, O. (2021): Pandémia- Paradigmaváltás a büntetés-végrehajtásban Nemzetközi kitekintés és a magyarországi jó gyakorlatok bemutatása 《流行病 - 范式转变在行刑机构中 - 国际概况和介绍匈牙利的良好实践》*Belügyi Szemle*, 5/2021. pp 12
- Deák, É. (2020): *Mediáció, az egészségteremtés művészete* 《调解, 即创造团结的艺术》Partners Hungary Alapítvány Kiadó. pp 20-25
- Feuer, M. (2008): *A családsegítés elmélete és gyakorlata* 《家庭支持的理论和实践》Akadémia Kiadó, Budapest
- Gönczöl, K. (2005): A szolgáltatott igazság 《司法》*Élet és Irodalom* XLIX., Évfolyam, 40. szám. pp40
- Hecker-Réz, R. (2021): *Az érzelmi intelligencia természetrajza, fejlesztésének módszertana: Az autokeirikus iskola rendszerében* 《情绪智力的性质, 其发展的方法: 在自体治疗学派的系统中》Mondat Kft. Kiadó, Budapest
- Kenneth, T. – Ralph, K. (1974): *Conflict Mode Instrument* 《冲突模式工具》CPP, Inc. Kiadó; USA
- Kerecsi, K. (2011): *Konfrontációs és kiegyezés, a helyreállító igazságszolgáltatás szerepe a közpolitikában* 《对抗与和解, 恢复性司法在公共政策中的作用》Budapest, Akadémiai Doktori Értekezés, 103p
- Koósné dr. Mohácsi, B. (2015): *A szabadságelvönös határai, Helyettesítő intézmények és alternatív szankciók a magyar és a német jog összehasonlításának tükrében* 《从匈牙利和德国法律的比较来看, 剥夺自由、替代机构和替代性制裁的局限性》ELTE Eötvös Kiadó Kft., Budapest 243p
- Lewitt, S.D. – Dubner, S.J. (2005): *Freakonomics: A rogue economist explores the hidden side of everything* 《魔鬼经济学》New York, HarperCollins. 242p

- Lovas, Zs. – Herczog, M. (2019): *A mediáció, avagy a fájdalommentes konfliktuskezelés* 《调解亦即无痛解决冲突》Wolters Kluwer Hungary Kft. Kiadó, Budapest
- Lőrincz, J. (2018): A büntetés-végrehajtási tudomány fejlődésvázlata hazánkban 《匈牙利监狱科学发展的概要》*Börtönügyi Szemle* 2018/1. pp 28
- MacKenzie L., D. (2006): *What Works in Corrections: Reducing the Criminal Activities of Offenders and Delinquents* 《什么在矫正中起作用?》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pp 220-222
- N. Kollár, K.– Szabó, É. (2004): *Pszichológia pedagógusoknak* 《老师的心理学》Osiris Kiadó, Budapest. pp 29-39
- Maier, Ch. – Wrana, R. D. (2008): *Autonomie und Struktur in Selbstlernarchitekturen, Emprische Untersuchung zur Dynamik von Selbstlernprozessen* 《自学架构中的自主性和结构-对自学过程动态的实证调查》Beiträge der Schweizer Bildungsforschung, Budrich Unipress.
- Schmehl, J. (2015): A neveléstől a reintegrációig: a fejlődés útja a legjobb gyakorlatok tükrében 《从教育到重返社会: 从最佳实践看发展之路》*Börtönügyi Szemle* 2015/1. szám. pp 104
- Resch, K. (2014): *Facilitating the Sycamore Tree Programme, Programme by Prison Fellowship for restorative justice in prisons* 《促进梧桐树计划的实施, 监狱联谊会在监狱中的恢复性司法方案, 建立桥梁, 欧盟的刑事司法方案》Building Bridges, Criminal Justice Programme of the European Union, JUST/2013/JPEN/AG/4479. pp 17-20
- Skinner, B.F (1953): *Some contributions of an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behavior to psychology as a whole* 《行为的实验分析对整个心理学的一些贡献》*American Psychologist*, 8. pp 69-78
- Somogyvári, M. (2021): A koronavírus hatása a fogvatartotti kapcsolattartásra – Kihívások és szervezeti válaszok, A fogvatartotti videóhívások alkalmazásának empirikus vizsgálata, 《冠状病毒对服刑人员探视的影响--挑战和机构反应, 服刑人员使用视频电话的经验研究》*Belügyi Szemle* 5/2021. pp 109-143
- Szokolczai, L. (2015): A bv. gazdasági társaságok társadalmi elfogadtatása, egysége és annak arculati megjelenítése 《监狱公司的社会接受度、统一性和形象》*Börtönügyi Szemle*, 2015/1. pp 42-50
- Vári, K. (2008): *A börtönlelkészség hét éve Magyarországon* 《匈牙利监狱牧师工作的七年经验》2008/1. pp48-61
- Zimbardo, P.– Robert, J.– Vivian, M. (2017): *Pszichológia mindenkinek* 《普通心理学》Libri Kiadó. Budapest. pp 32-38